

汉字构造中的认知思维

杨鑫悦

(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, 北京 100875)

摘要: 认知语言学关注语言与认知能力之间的关系, 认为语言使用的基础是日常经验, 语言是人们进行认知活动的工具。《说文解字》作为我国最早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传统语言学专著, 展示了古人对语言和客观世界的认知过程。本文对汉字构造体现的范畴观、理据性及意象图式进行分析, 阐释我国传统语言学蕴含的认知思维, 为语言学研究提供新视角。

关键词: 汉字 认知 范畴 理据 意象图式

中图分类号: H122; G64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3-9082 (2022) 10-0251-03

引言

“六书”的概念最早出现在《周礼》中, “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, 乃教之六艺, 一曰五礼, 二曰六乐, 三曰五射, 四曰五驭, 五曰六书, 六曰九数。”此时“六书”指周朝官学学生应掌握的六种才能。东汉班固把六书定为象形、象事、象意、象声、转注、假借。郑玄提出“六书, 象形、会意、转注、处事、假借、谐声也。”他们分别对六书的概念进行解释, 但指称并不明确, 语焉不详。许慎在《说文解字·叙》中归纳总结了古文字构造的特点, 在举例说明的基础上, 明确了“六书”的定义, 即“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、转注、假借”^[1]。据此, 清代学者戴震提出“四体两用”理论, 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为四种造字方法, 转注和假借为两种用字方法。

20世纪70代中期, 随着心理学、认知科学、神经科学等学科的发展, 认知语言学逐渐兴起, 提出语言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认知系统, 语言描写必须参照人的一般认知规律。语言是人们通过认知思维和心理活动, 对客观世界经验进行概念化和结构化的结果。认知包括感知觉、知识表征、概念形成、范畴化等, 生理构造、身体经验、感知觉能力、想象力等因素也在认知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。目前, 认知语言学已成为语言学领域的主流研究之一, 是当代语言学的重要分支。

本文将认知语言学的范畴观、理据性及意象图式理论应用于对汉字字形构造的分析中, 用当代语言学理论解释我国传统语言学专著《说文解字》。由于转注和假借是用字方法, 本文不对它们进行分析, 对汉字构造中认知思维的阐释主要集中在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四种造字方法上。

一、汉字构造的范畴观

人们在互动体验基础上对客观事物本质在思维上的概括

和反应, 由一些通常聚集在一起的属性所构成, 这些完型概念即为范畴。范畴化以经验为基础, 以主客体相互作用为出发点, 是对外部事物、事件、现象等进行主观概括和分类的心理过程, 赋予世界由无序走向有序的结构, 是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^[2]。

《说文解字》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, 共划分了540个部首。从汉字形体来看, 汉字的形符大多来自独体字中的象形字, 象形字是基于事物的外形特征, 用笔画勾勒和描摹外观的文字, 依据字形即可理解字义。象形字既能单独使用, 也可以充当其他文字的部首。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循序渐进的, 《说文》界定的象形字基本都是对生活实际存在的事物进行刻画和书写, 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最先感受到的是有形具体的物体, 象形字是指事字、会意字、形声字等其他文字的基础。以指事字“上”“下”为例, “上”本义是高, 短横为指事符号, 表明事物位于大地之上; “下”本义是低, 短横指事物位于天空之下, 指事字在象形字上添加指事符号而形成。当象形字充当其他文字的构件时, 它成为表示意义范畴的形符, 也叫义符。

尽管象形字是人们通过感受具体有形的事物而描摹出的文字, 但图画转换为文字的过程也体现了人们认知思维的抽象性和归纳性。比如象形字“月”作偏旁时, 本义指肉, 所以“月”作偏旁的字多与身体部位相关, “月”成为表示身体部位范畴的原型, 对范畴进行抽象的图式表征。在字形上, 与身体部位范畴相关的事物表现为以“月”作为构形部件, 生成以“月”为部首的汉字, 如“腿”“脸”“腰”“脚”“膝”“肩”等。有些象形字从独体字转变为形符时, 原有形体发生变化, 比如“火”变为“灬”“水”变为“氵”“手”变为“扌”等, 但变化前后的语义没有差别。以“火”为例, “火”分化出的偏旁“灬”

成为常见的构字部件，“燃”“焦”“熟”“热”“煮”“煎”等字在语音上虽与“火”没有关联，但在意义上与“火”联系紧密，表示了“火”的不同状态和用途。

范畴凭借典型特征和家族相似性联系起来，其内部不同成员的隶属程度存在差异，范畴具有模糊性和层次性，包括基本范畴、上位范畴和下位范畴。在认知过程中，基本层次的显著度比其他范畴层次更高，所以人们通常在基本层次上称呼事物^[3]。当基本范畴相同时，对事物特征的分类依据不同，划分出来的下位范畴也有所不同。比如基本范畴是“木”，根据树木的集合状态，可以划分下位范畴“林”“森”；根据树木的组成部件，可以划分下位范畴“根”“枝”；根据树木的繁盛状态，可以划分下位范畴“荣”“枯”；根据树木材料的功能，可以划分下位范畴“柜”“框”等。下位范畴是按照感知、功能、交际、知识结构的顺序进行划分归类的，体现了人们认知思维的渐进性和组织性。

二、汉字构造的理据性

汉字字形在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中，一些基础部件的原有形态发生变化，逐渐趋于符号化，但中华民族的认知思维在文字符号的演变中是一以贯之的，汉字构造体现的理据性与语言认知中的隐喻密切相关。概念隐喻理论指出隐喻遍及人类常规的概念系统，对人们的的生活方式、概念化经验方式及说话方式都产生了广泛作用^[4]。隐喻蕴含人类思维的认知规律，通过映射在源概念和目标概念之间建立相互联系，帮助人们用已知的、具体的事物去认识全新的、抽象的事物，隐喻既是思维方式，也是文字字义扩展和引申的途径。

象形和指事一般只对单一静态事物进行图形示意，而会意和形声能够展示事物在运动过程中的关联。根据事物间的联系，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独体的文组合起来，使其意义相互融合，即为会意。会意字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，它的产生与构造是人们对外界事物认知和表达的结果。以“习”字为例，“羽”指鸟的翅膀，“白”表示“自己”，“习”用“羽”“白”会意，本义指鸟类反复飞翔。基于社会生活经验的深化，人们赋予“习”新的含义，把它从具体概念域映射到抽象概念域，引申出学习、练习、熟悉等隐喻含义。汉字本义体现字形与字义的关系，而本义与引申义的关联则表现为汉字基于认知思维而产生的理据性。形声字由两个文或字复合组成，义符或形符表示事物类别，声符或音符起标音作用。以“江”字为例，形符“氵”表示类别，声符“工”表示读音，形声字的构造明确体现了汉字的

理据性。

人类思维认知机制还包括侧重表示指代功能的转喻，转喻用一种实体代替另一种实体，其映射发生在单一认知域矩阵中，《说文》中某些部首体现的理据性也能对转喻思维加以解释。比如“品”字部首，“口”表示人，“品”用聚集状态代指“众多”之意，通过事物或人物的出现场景表示状态特征，是用整体指代部分的转喻。而“晨”字部首的甲骨文字形上部分象双手之形，下部分象农具之形，两者会双手持农具耕作之意，古人的生活作息为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“晨”的汉字构造通过对特定时间内人物习惯动作的描摹，代指动作事件发生的时间，是部分指代整体的转喻。

字形演变的过程中，汉字的理据性也在经历着显隐变化。有的汉字构造在字形演变中理据清晰，意象明确。如会意字“明”，从月从囧，字形直观展现字义，月光照射在窗棂上，表示明亮的意思。有的汉字字形演变体现了经济性原则，某些部件的意象走向符号化，理据性比较模糊。如“彡”本义指须毛和画饰的花纹，根据花纹的波浪形状，“彡”从源域引申到视觉概念域，“鬢”表示头发飘逸的样子，“彡”还引申到嗅觉概念域，“鬱”表示香气弥漫的意思，而“鬢”和“鬱”简化后的汉字“发”和“郁”均已看不出原有部件的意义。还有些文字构件发生讹变，掩盖了原始意象，使理据性难以辨析。比如象形字“囧”描绘竹子或木杆撑起窗子的图画，本义指明亮。近年来随着网络用语的盛行，由于“囧”字形与人脸形状和表情较为相似，被赋予了网络时代的象形意义，成为流行的表情符号，表示郁闷、尴尬之意，字形构造的理据性存在模糊混淆的情况。

此外，假借和转注也体现了汉字的理据性。由于汉字数量有限，人们在用字过程中假借已有的汉字字形来表达新的含义，为区别意义，有的汉字在原有字形基础上添加其他表示字义的部件，成为分担源字记录职能的分化字。比如“着”从“著”中分化出来，表示进行、着手等含义，而“著”侧重表示与写作、书籍相关的意义。

三、汉字构造与意象图式的关系

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古人对周围环境的观察、体验和描摹，文字起源的第一阶段是根据天象、地理、鸟兽的斑纹、土地所宜等可以观察的对象创造象征符号。到了皇帝时代，仓颉看到鸟兽足迹，意识到不同纹理具备不同含义，开始文字的创造，仓颉造字的主要方法是描摹物象形体，其后对文进行注音，使之成为字。索绪尔把世界文字分为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两大类，表音文字记录和模写词中声音，表意文字用符号代表词，该符号与词的含义有

关。由于汉字字义与读音没有必然联系，而是通过字符本身所表达的观念记录语言意义，所以汉字为表意文字。汉字形成初期，古人的逻辑思维能力有限，对外界事物的认识主要停留在“依类象形”的描摹、储存及记忆阶段，随着对周围世界的日渐熟悉和认知思维能力的提升，汉字的创造逐渐走向“因义赋形”“以形表义”的阶段^[5]。汉字从单体字向合体字发展，从象形字、指事字向会意字、形声字演变，义符和声符共同构成的汉字使意象符号化，生成能够传达所指概念的意象图式，反映了人们在心理认知上对客观事物的把握。

意象图式和隐喻投射是想象和理解的两种基本结构，意象图式基于人们与外部世界的多次接触和经验积累，总结出能够联系具体意象与抽象概念的组织结构，从一个领域投射到另一个领域，对周围环境中存在的相似关系进行延伸推理，解释其他领域的抽象概念^[6]。意象图式源自人类概念化认识事物的能力，人们可以通过隐喻将具体事物、基本概念、基本范畴与抽象事物、复杂概念、一般范畴联系起来，理解语言运用的更多情况。空间关系是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的基础，汉字构造反映了古人的空间意识，他们通过生理基础和身体经验，感知事物的空间位置，把对汉字形态的认识从现实空间映射到概念空间，生成有关字形结构的意象图式，具体包括左右图式、上下图式、容器图式等。

左右图式对应的身体经验是，人体器官是左右对称的，人们借用左右手的位置关系表示相应的空间概念。比如“江”“河”“海”的义符都是“氵”，表示字义与水相关，而右侧偏旁的不同决定了它们读音的不同，在表音过程中，左侧义符被空白化，右侧声符被凸显窗口化。“脑”“恼”“恼”的读音相同，但意义不同，“脑”从月，表示神经系统的主要部分；“恼”从心，表示发怒或苦闷的情绪；“恼”从土，表示山岗或丘陵较平的顶部，左侧义符决定了它们各自的表达意义，在表意过程中，右侧声符空白化，左侧义符被凸显窗口化。

上下图式对应的身体经验是，人们借用头和脚的位置关系表示上下的空间概念，人类在客观世界中通过观察，能够感受物体在空间位置上的高低差异。上下图式字形结构中义符、声符的空白化和窗口化也是互相对应的，比如“煮”“蒸”“熟”下部义符相同，字义均与火相关，而上部声符不同，所以整体发音不同，上部声符窗口化，下部义符空白化。而“萧”“箫”“霄”的读音相同，意义不同，则体现了下部声符空白化，上部义符窗口化的意象图式特点。

容器图式对应的身体经验是，完整的身体由不同的器官

组成，其构成要素是内部、外部及内外边界。比如“国”由“口”和“玉”构成，表示疆域内的美好事物，引申指代国家之意，“玉”只有包含在“口”的范围内才是“国”。汉字构造中的容器图式不仅包括全包围结构，还包括半包围结构，比如以“辶”为偏旁的字是半包围结构，字义与走路或跑步相关，部首为“口”“匚”的字也是半包围结构，如“凶”“区”等。

结语

在对汉字构造进行多样化分析后，可以发现古人在创造文字和记录语言的过程中，已经带入了对客观世界的体验和认识，汉字的字形构造是认知思维在语言文字上的反映，这在当时虽然是无意识的，不具备系统性，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与当代认知语言学的观念有所重合。

《说文解字》部首的编排方式体现了认知语言学的范畴观，象形字可以演变为指事字、会意字、形声字的构件或偏旁部首，该过程涉及原型范畴、基本层次理论，汉字形体能体现基本范畴和下位范畴，印证了人们认知思维的归纳性、渐进性及组织性。汉字字形和字义演变体现的理据性，与隐喻和转喻密切相关，随着认知思维水平的发展，字义从具体概念域映射到抽象概念域，在本义基础上引申出其他含义，证明人类认知思维存在理据性，理据性在字形演变过程中也经历着显隐变化。汉字是表意文字，汉字构造是视觉观察和思维认知的共同结果，人们在观察事物的具体形象后，抽象总结出某类事物的共同特征，赋予客观事物主观认识的印记，使物象具备特定含义。义符和声符构成的字形使意象符号化，人们通过生理基础和身体经验感知事物的空间位置，生成有关字形构造的意象图式，反映了认知思维中的空间意识。

语言研究需要具备宏大的研究视野，虽然认知语言学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才产生于西方的语言学流派，但我国东汉时期的传统语言学专著《说文解字》中关于汉字构造的解释已经传达了认知思维的观念，汉字和汉语具有不容忽视的语言学意义。

参考文献

- [1]许慎.说文解字(简本)[M].上海:上海教育出版社,1963.
- [2]王寅.认知语言学[M].上海: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,2007.
- [3]张维鼎.意义与认知范畴化[M].成都:四川大学出版社,2007.
- [4]赵艳芳.认知语言学概论[M].上海:上海教育出版社,2001.
- [5]王宁.《说文解字》与汉字学[M].郑州:河南人民出版社,1994.
- [6]李福印.意象图式理论[J].四川外语学院学报,2007(1):80-85.